

學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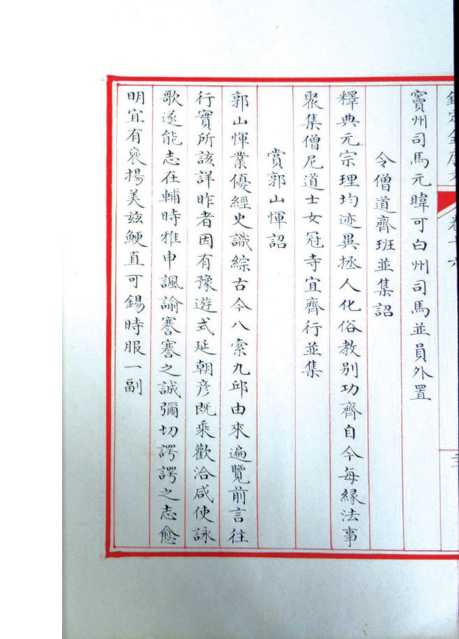
◀ (上接9版)

几点可以特别指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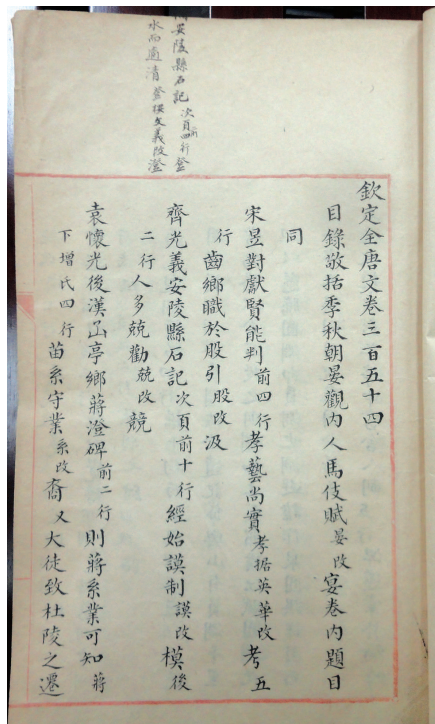
编修缘起及宗旨。笼络士人、彰显文治是一般看法。夏婧特别注意到嘉庆十三年(1808)修书诏颁布之初的说明是“崇文讲学”，十九年御制序则特别强调“至释道之章咒偈颂等类，全行删去，以防流弊，以正人心”，与前一年政令申明“修礼明教，秉正抑邪”一致，应与清廷当时疲于应对天理教教徒起事、整顿政务有关。

关于《全唐文》的底本。葛兆光教授《关于〈全唐文〉的底本》(刊《学林漫录》九集，中华书局1984年)据清人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考知，清廷重辑时所据旧本《全唐文》为海宁陈邦彦所编，由两淮盐政苏楞额在乾隆末年进呈。《经过》一文曾据法式善的记录稍有推知。夏婧有幸发现上海图书馆藏《全唐文目》钞本五册，曾为阮元所有，经比对有关陈邦彦辑本的各类零星记录，精密考订，确认这部钞本就是陈书的相对完整的篇目，可能是在新本编纂期间录副以便比对分析者。据此知陈书全书分十六函，每函十册，以撰人立目，收录具名作者近一千九百人，存文一万一千余篇，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、唐人别集所存文章，已经悉行收入，且于地方文献也颇有采录，可当“卷帙因富”“采辑大备”之评价。至于此本之误收，如房玄龄名下收《权文公遗表》，将吕温自撰作品以“温自作”列目，将杜元颖编入初唐，将富嘉謨编入五代，皆以往所不知者。误收篇目，不仅有刘宋孔熙先、赵宋王珪文，将三国请立诸葛亮庙表误为后蜀文，甚至收到清人吴镜秋的词作。非单行篇目，则收入从《晋书》到《旧唐书》各史论赞四十多篇，又收入不少史传中的问答奏对语。夏婧更指出后者当录自明初所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。陈邦彦辑本总目之发现，夏婧认为此书“为清廷后续工作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”，我还愿意指出嘉庆馆臣之新编，不仅纠正了陈书的众多错误，也彰显新本的总体学术质量，在常见文献以外增加八九千篇，谈何容易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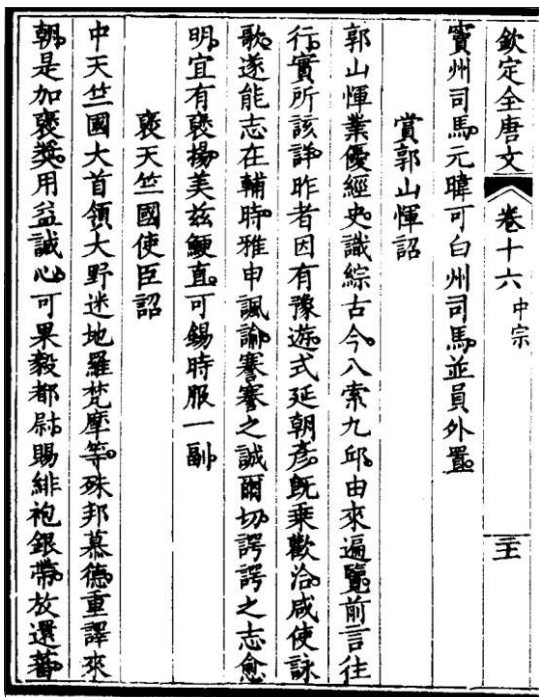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编修人员。《经过》主要关心负责编纂事务的总纂官九人，本书则对所有正副总裁及总阅官、提调官、总纂官、纂修及协修官、收掌官及佐修人员，以及未列名而曾参与修书者，于各人生平及于此书之贡献，皆有细致的记录。对扬州刊校人员，则另列一节加以罗列，其中涉及嘉庆时期许多著名学者，如秦恩复、梅曾亮、顾广圻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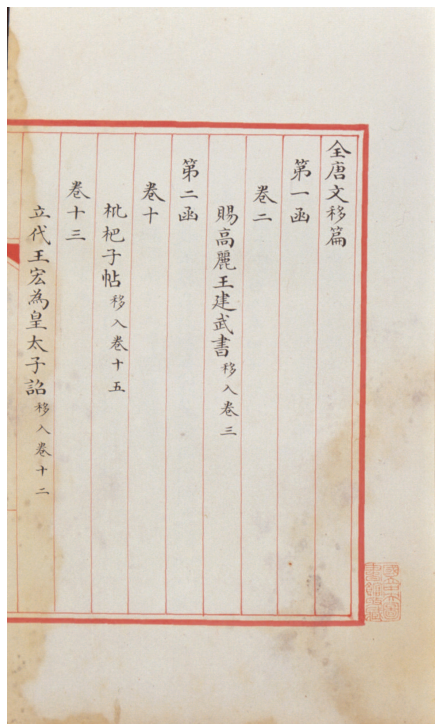
内府抄本《钦定全唐文》卷16

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全唐文校档》



嘉庆刊本《钦定全唐文》卷16



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藏《全唐文移篇 删篇补篇目录》

赵魏等。所涉细节很多，如以往一直传严可均因未能入《全唐文》馆，负气编上古三代以下历朝文，夏婧则确认严氏虽未入馆，但曾代为辑录《金石萃编》以外的碑版文，不存在入馆遭拒事。《经过》有一节写到总纂陈鸿墀与总裁董诰之矛盾，夏婧则指出陈因编书获优奖，被贬是因讹写先帝庙号，后期仍参与扬州唐文馆之刊校。

《全唐文》成书的编纂定稿过程，则因有编纂底稿二种之发现，得以知晓许多细节。一为上海图书馆藏《全唐文》底稿七卷，为潘重规旧藏，2008年、2010年嘉德国际两度拍卖后成交，媒体多有报道。所存为卷510、卷512、卷513、卷531、卷539、卷551、卷556。二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全唐文》稿本十九册，存卷91至卷100之目录，及卷72、卷77等十八卷。从上图本可以见到，该本最突出的钞写特征是作者小传与首

篇正文、各篇正文之间均不接续，每篇作品单写，且文本内有大量校订批语，如陆长源《唐东阳县戴公去思颂》，天头处有据正本、石本校录的大量异文，且因校改颇多，另眷清录正一遍，以便付刊。小传部分，则多先据正史本传节录，复据其他材料补充改写。具体篇目方面，也曾据多种文本会校，有时甚至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敲。涉及文辞忌讳与避本朝讳的改动，也多存痕迹。北大本更见同一文曾经多人比校，许多批语粘签仍然保存。这些底稿，可以看到在乾嘉学术风气下编修诸臣之治学态度，可惜未能贯彻始终，已出校者亦未能全部吸收在定本中。

《全唐文》初编完成后，于嘉庆十九年(1814)二月由总裁董诰奏请付刊，至二十一年十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奏告刻成，二十四年正月同人奏，则得嘉庆帝御制诗，补入刊本再度刷印。此三篇奏状在清宫档案

中发现，知道《全唐文》定稿及初刊的基本情况，也知有御制序者为二次印本。

夏婧发现，阿克当阿收到内廷移交的两部《全唐文》钞本，其中一部今存上海图书馆，每卷为一册，十册为一函，总计一百函，与阿克当阿奏状所述一致，为正副本中的正本。夏婧比对后发现，正本部分篇目的增删痕迹，显示文本在正式付刻前仍反复校改，最终篇目与刊本趋于一致，偶有拟删而未尽者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存《全唐文校档》，存105页，所涉为卷351至卷390部分。夏婧考察后认为校档内容源于对正副本的文本比勘，成于扬州覆校阶段的可能较大。相关校勘意见对唐史、唐制有充分理解，整理者凭借传统经史学养校正文字讹误的成绩尤为突出。但因书成众手，确当的校改未能贯彻始终，从而影响全书的质量。

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藏《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》，存三册，署清人蒋衡编。涉及移文185篇，删作者10人、文118篇，补文增作者14人、文54篇。夏婧认为蒋衡卒于乾隆初，未参与《全唐文》清廷重纂，也与陈邦彦书无关，编者误署。此目录实际是在钦定《全唐文》付刊前，在扬州比对初纂正、副二本时所作的调整与补充，可部分反映初编阶段的文本状况。

以上部分，因为第一手地发现《全唐文》编修、付刊阶段的大量原始文案，除正本钞本外，各部分均属零残，仔细推敲分析后，夏婧发现许多以往人们不了解的隐情，并由局部推衍全书编修体例与校订，新见纷呈，保证全书的学术品位。

关于《全唐文》的文本来源，日本学者早年做过两部很杰出的著作，在此不能不提到。一是平冈武夫、今井清编《唐代诏敕目录》。前者为《全唐文》中的作品逐篇标注文本来源，常见别集与总集都用到，虽然注出者仅占全书十之六七，毕竟很有用。后者非为《全唐文》而编，但将有唐二百八十九年间逐年逐月逐日所颁诏敕，均标识文本来源，无论完残，也不论《全唐文》收录与否。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辑录《全唐文补编》时，我曾向历史系徐连达教授借用过日本原版，收获很大。夏婧的目标是为《全唐文》所有二万多篇文章找到较早的文本来源，也希望确认《全唐文》编纂时依据的是哪一文本。在《全唐文》原书解题、校记、考异中，偶会提到，数量很少。前述编纂时的各种文档，有较多的线索，可惜当年因成于众手，为求画一体例，全书一律不注来源。夏婧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，为全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找到了文本源头。这一工作，她在提交论文前已经完成初稿，但彻底写定极其艰难，我建议她在答辩时不必提交。因为篇幅较大，此次尚难一起定稿，可稍晚另书出版。本书所附《〈全唐文〉编纂用书目》，虽是简单的推测书目，即是据新编文献来源篇目排定，读者宜有所注意。在上述工作基础上，方有本书附录二《〈全唐文〉文献来源待考篇目》，除李商隐、陈致雍肯定出于《永乐大典》的近三百篇作品以外，待考者还有159篇，约占全书百分之零八点。此部分有近百则简注，对各文的相关线索加以说明，可知诸篇大致可靠，来源可能为《大典》或今所